

學術論文

歷史記憶與華人認同：馬來西亞柔佛河婆文物館分析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Chinese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Johore Hopo Cultural Museum, Malaysia

林開忠 *Khay-Thiong Li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府，延續並接受了英國殖民所留下來的文化政策與國家治理的種族意識形態，馬來多數族群為他們在殖民時期所失去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力，極力在獨立後重新建立其優越與獨尊的地位，以服膺這塊被稱為「馬來土地」的國家，因此，在教育和文化機構裡，體現馬來主權以及伊斯蘭主義特色的國族敘事，忽略少數族群歷史文化以及不利於主流論述的被殖民歷史、日據時代、共產黨抗爭等。本文在這樣的脈絡下探討作為少數族群的華人，透過民間結社的力量，聚族以捍衛自身的權益；同時通過成立文物館，以展現他們的歷史記憶，並將河婆性/中國性與華裔馬來西亞性雜糅在一起，形成一個獨特的華人身分認同。

After independence,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continued and adopted the cultural policies and racial ideologies left by the British colonialist. The

Malay majority was in aw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wer they lost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Efforts were made to re-establish the superior and exclusive status of the Malays in the country known as “Tanah Melayu” (Malay land). Therefore,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the national narrative of Malay sovereignty or supremacy and Islamist characteristics are strongly guarded, at the expense of marginalizing minority groups’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colonial histor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Communist struggles, etc.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Chinese Malaysian, as a minority group, use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association to defend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museums, they display their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a hybridized Hoponess or Chineseness and Chinese-Malaysianness as a unique Chinese identity within Malaysian context.

關鍵詞：河婆、文物館、歷史記憶

Keywords: Hopo, Cultural Museum, Historical Memories

壹、序言：從尊重多元到獨尊單元文化

1957年馬來亞獨立，執政的聯盟政府（Alliance government）延續了英國殖民時期政策，對新興國家的文化事務採自由放任態度，但這樣的態度也逐漸在獨立後為馬來文化菁英所不滿，他們認為既然馬來人是這塊土地的主人，¹理應在文化、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都能由馬來人掌控或主宰，而非獨立後還停留在殖民時期那種壓制或消滅文化的政策，並眼睜睜看著外來移民在他們的土地上繁榮昌盛。這種對聯盟政府的不滿持續累積，終於在1969年馬來西亞第三屆大選讓聯盟政府挫敗後，成為這些不滿情緒爆發的導火線。²這樣的選舉成果，更增添馬來菁英對失去馬來土地和政權之焦慮。³

1969年513事件後，政府頒布全國戒嚴（也稱為緊急狀態）、停止國會正常運作、對反對黨招降納叛、以及成立由軍、警、黨聯合掌權的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取代政府職能，平息此次族群衝突與政治危機。為促進多元族群與文化的馬來西亞社會之和諧共存，國民團結（national unity）成了執政者的重中之重。1970年，國家諮詢委員會

¹ 也就是馬來人對半島馬來亞這塊土地的稱呼—*Tanah Melayu*。所以，在獨立前所制定的馬來亞聯邦憲法主要有英文與馬來文版，英文版寫成：Fede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a，馬來文版則是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現在馬來西亞鐵路局的簡稱為KTMB，全稱則是 *Keretapi Tanah Melayu Berhad*，因此，從語言來看，馬來精英對這塊土地的獨佔認知。

² 在那場選舉中，聯盟政府首次失去了國會三分二席次的優勢，失去國會三分之二的多數優勢，將使得聯盟政府的政策推行產生阻擾，同時也讓政府無法隨心所欲地修改憲法條文。同時有幾個州為反對黨掌控多數議席，即反對黨將成立州政府。

³ 後續的發展是反對黨因勝選而遊行慶祝，在吉隆坡遊行中出言侮辱馬來人。部分馬來精英累積的不滿，透過這次選舉所創造的焦慮和機會，動員馬來群眾於吉隆坡展開反遊行，最後使得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爆發流血衝突；同時也在聯盟內引爆對親英、自由派馬來菁英的權鬥。時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遭巫統黨內逼宮，最後黯然下台，而由其副手阿都拉薩胡先（Abdul Razak Hussein）繼位。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 成立並提出了類似印尼建國五原則 (Pancasila) 的國家原則 (Rukunegara)，誓言要：

- 達致全體人民更緊密的團結；
- 維護民主生活方式；
- 創造一個公平社會，依公平分享國家的財富；
- 確保國內各種不同而豐富的文化傳統獲得寬大的對待；
- 建立一個基於現代科學和公益的進步社會。⁴

從國家原則的宣言，可以得知基本上它宣稱會確保寬宏對待境內多元文化傳統，以促成國民團結。其他同一時期陸續推出的政策，如新經濟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也是以國民團結為目的，希望透過經濟上的扶弱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以使馬來人與非馬來人能共享經濟發展成果，促成國民和諧一致。不像新經濟政策，國家原則事實上並沒有回應馬來文化菁英對於馬來文化主導權、馬來文化在殖民時期遭受打壓而瀕臨消失的文化恐懼。透過凝聚馬來學術與文化界共識的馬來文化大會，馬來文化菁英最終使得政府接納為其國家文化政策 (National Culture Policy) 的基礎。

根據馬來西亞文化與藝術部 (Jabatan Kebudayaan dan Kesenian Negara) 的官方網站，敘明國家文化政策的三大原則：即：

- 一、國家文化必須奠基於此區域 (region) 的土著文化 (indigenous culture)。⁵這裡所謂的區域指的是包含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汶萊、泰國、柬埔寨以及南太平洋島嶼 (玻里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以及大洋洲) 甚至遠達東非馬達加斯加，換句話說，就是指南島

⁴ 參考“Rukun Negara”，網址：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kun_Negara。檢索日期：2020年9月3日。

⁵ 在馬來西亞的政治論述中，通常 indigenous 被譯成土著而非當代習慣的翻譯—「原住民」，因為「土著」(馬來語稱為 Bumiputera) 是包含所有東西馬的馬來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的原住民，而「原住民」在馬來西亞通常指涉非穆斯林且非移民的群體。

語族分佈的區域，也是馬來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場域...。

二、其他文化適當的元素或可被納入國家文化中：由於文化是動態的持續適應與同化的變遷過程，且亦考量到馬來西亞的多元種族與文化之現實，因而擬定將適當的其他非馬來文化元素也納入國家文化中。所謂適合的其他文化元素則必須符合憲法條款以及國家原則，同時還必須考量國家利益、道德價值以及伊斯蘭教作為國家官方宗教地位의各種因素。

三、伊斯蘭教為國家文化構成的重要部分：宗教或信奉上蒼是國家發展及國民個人發展的重要面向，伊斯蘭教提供人類指導方向以及滿足人類的身心需求，因此，作為國家官方宗教地位的伊斯蘭教也必須是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元素之一。⁶

從國家文化政策的三原則中，我們可以知道它集成了馬來政治菁英自 1969 年 513 事件後，試圖重新詮釋有關公民權和憲法條文中有關馬來人特殊地位，認為馬來（西）亞乃是馬來人的國家，且它只為馬來人所有的馬來民族主義者所謂「馬來霸權/政治至高權力/主權/主宰」（*Ketuanan/Kedaulatan Melayu*），在這樣的論述下，那些祖先非源於馬來（西）亞的非馬來人就不可能在政治權力及地位上獲得國家平等對待，這是其中一個 1970 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執政者的意識形態。另外一個意識形態則是從 1970 年代後開始出現的伊斯蘭教主權論（*daulat Islamiyya*），它在 1980 年代馬哈迪執政時期獲得更大的發展，並逐漸發展成將馬來西亞視為伊斯蘭國家（*negara Islam*）。⁷國家文化政策凸顯了這兩個馬來政治意識型態。

⁶ Jabatan Kebudayaan dan Kesenian Negara, 網址：

<http://www.jkkn.gov.my/en/national-culture-policy>。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7 日。

⁷ Ting, Hele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West Malaysia: Continued Mutation or Critical Transition?”, 東南アジア研究. Vol. 47, Issue 1 (2009), pp. 31-51.

在馬來主義（Melayuism）與伊斯蘭化的意識形態下，從 1980 年代起至今，馬來西亞社會中不停地重演著各種宗教、語言、文化、教育等等的衝突戲碼，譬如禁止馬來語聖經用 Allah 來指涉 God、反貪委員會中文網站的爭議、華文小學不能掛燈籠以慶祝節日，以及為了早日達成國民團結，應該關閉母語學校（vernacular school，泛指華文及淡米爾文小學）等等。為服膺同質化的馬來主義與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政府更將前伊斯蘭時期的馬來亞歷史硬生生從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抹除，讓當今的馬來穆斯林切斷跟印度—佛教祖先們的關係，突出或獨尊伊斯蘭在馬來文明與文化的地位，「進一步強化了一個擁有本質化歷史之本質化馬來人的殖民刻板印象，拒斥馬來文化的多元性和混雜性，最終創造出一個簡化的馬來『種族』和社群，即只是個伊斯蘭跟本地的馬來人罷了」。⁸歷史教科書的伊斯蘭化之外，更貶低、誤導及刻板化關於華人的形象。⁹在這樣的國家文化氛圍下，作為馬來西亞少數族群的華人文化在公共領域裡受到邊緣化，但國家並沒有完全壓制或禁止少數族群文化在非公共領域的表達；因此，華人文化在國家文化的隙縫中如何生存與展現是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本文從柔佛州河婆同鄉會附設的河婆文物館為分析材料，試圖說明華人如何透過歷史記憶的再現來凝聚認同的方式。

貳、從擬血緣姓氏宗親到地緣同鄉會

在分析柔佛河婆文物館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文物館創建或管理機構—柔佛州河婆同鄉會—這個組織。顏清煌認為新馬地區最早以方言或地緣創立社團組織的華人語言群體是客家人，原因就在於他們較其他語群來得弱

⁸ Farish A. Noor, *What Your Teacher Didn't Tell You. Volume 1.* (Petaling Jaya: Matahari Books, 2009), p.86.

⁹ 安煥然，〈華小四、五年級歷史課本編寫及史實內容評析〉，莫順宗、伍燕翎（主編），《新的紀元：東南亞華人新編》。（Seri Kembangan：馬來西亞華總東南亞華人研究中心，2017），頁 12-23。

勢或人口比較稀少的緣故。¹⁰但並非所有我們今天所謂的客家人都最早創立自己的地緣組織。有一支客家人—河婆人—他們的地緣組織甚至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立，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經濟勢力與人口數居於弱勢。從藍清水對馬來西亞河婆人的研究中，大概可以知道河婆人很早就參與開發婆羅洲與馬來半島的金或錫礦以及後來的經濟作物種植，也大致了解在馬來半島的河婆人從北往南及從南往北進行內部移民的大致過程。目前全馬大約只有 15 萬左右的河婆人口，跟其他方言群的華人人口比較起來，簡直小巫見大巫。由於「河婆人大部分是務農，其次是礦工、雜工等勞動者，營商的大多是做小生意，罕見大企業，至於受高等教育的又有限，在學術上有成就的無幾。」因此，河婆人常覺得自己「社會上毫無地位……許多河婆鄉親都有自卑感，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河婆人。」¹¹

務農的河婆人從新加坡到馬來半島南北遷徙，尋找適合的土地進行開墾。在柔佛地區的早期河婆先驅者如黃子松就是從新加坡過來士乃，先是經營雜貨生意，之後由於鳳梨價格很好，他就租地種植，並雇用河婆同鄉從事種植工作，於是大量河婆人進入士乃。士乃曾經有過 95%的居民為河婆人的盛況，故有「小河婆」之稱。當士乃河婆居民人滿為患，人們則往東邊的海南港、西邊的恆順港以及北邊 24 碑到 35 碑之間的內陸地區擴散遷移。隨著二戰後英殖民政府回鍋執政，為防堵共產勢力擴張，施行布里格斯計畫（Briggs' Plan），將居住在山區邊緣、偏僻鄉間的華人強制遷移到都市近郊或易監控地點的「新村」（New Village）居住，以切斷人們跟共產黨人的聯繫和接觸。這些被遷置的華人中有許多都是河婆人，柔佛古來的九個新村以河婆人為主。¹²

¹⁰ 顏清煌，《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廈門：廈門大學，2005）。

¹¹ 藍清水，《馬來西亞的河婆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7）。頁 82。

¹² 24 碑與 35 碑也就是今天的加拉巴沙威、亞逸文滿和武吉峇都所在的位置。張如嬌主編，《飄洋過海創新天：河婆人南來的故事》。（吉隆坡：馬來西亞河婆文化基金會，2017），頁 32-47。

1958年，霹靂河婆同鄉會率先在怡保創立，這是馬來半島第一個河婆同鄉會，其影響也外溢到其他地區。到了1960年代，柔佛州古來地區就有河婆人倡議要籌組同鄉會，因為古來有眾多的河婆居民，綜觀其他華人方言群都已先後成立自身同鄉會，唯獨河婆人沒有。但這只是初始的倡議，並沒有人出來有效領導，只能說是一股暗流。1962年12月16日，霹靂河婆同鄉會在成立後第四年，購置了辦公大樓，正式掛牌揭幕，部分柔佛河婆鄉親也被邀請參加。目睹霹靂同鄉平地起高樓的盛況，激勵了柔佛河婆鄉親，原先的暗流逐漸湧現出來。在一些熱心同鄉的運作下，以口信通知居住在古來、士乃以及加拉巴沙威等鄉鎮的河婆人，到古來商討籌組同鄉會事宜，惟反應卻出奇的冷淡。這可能是因為河婆人多居住在柔佛鄉鎮區，作為鄉區中的華人多數群體，他們甚少覺得有需要組織起來；再者，1960年代初，馬來亞才剛獨立不久，經濟正在起飛的初階，柔佛的河婆人也大多還是務農為主，雖然經濟狀況已經有些起色，但相較之下，尚無法擁有大量的經濟資本來維持同鄉會之運作；第三則是在加拉巴沙威新村的河婆人有著各姓氏（主要為張蔡劉黃四個大姓）的宗親社團，大姓獨立成團，小姓則合縱連橫，姓氏宗親會似乎才是村民們的日常社會結合方式，要跨出姓氏宗親的圈圈，合作推動一個河婆的同鄉意識就會有所阻礙；最後可能也是最實際的問題就是一旦同鄉會成立後，接下來就需要籌措大量的資金，以便能夠讓同鄉有個落腳的地方，而這項艱鉅的任務是許多同鄉會草創期都必須面對的，而古來的河婆同鄉似乎還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承擔這項巨大的任務。

1969年3月15日，傳來吉隆坡河婆同鄉成功整合並成立同鄉會的消息，這又進一步刺激了起步較早但遲未完成整合的柔佛河婆同鄉。隨後發生513族群流血事件，雖然主戰場在吉隆坡，但全馬各地也相繼受到影響。1970年代，馬來西亞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經濟時期，獨尊馬來文化的國家文化政策，以及強調扶持土著族的新經濟政策相繼出爐（請參考上一節）。各種華人社團組織也因此結合起來，共同面對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政策

的挑戰。1973年1月7日，在劉順儀、巫瑞秋、黃萬七、劉天范等人的倡議下，柔佛河婆鄉親再次於古來客家公會舉行座談會，這次的會議除了邀請古來、士乃等鄉鎮的河婆人參與外，也擴大邀請含蓋整個新山縣區的河婆人。這樣的策略是成功的，可能是因為對居住在都市地區如新山市的河婆人而言，他們在那裡是華人中的少數群體，且在都市區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不同的華人，在日常互動中，都市的河婆少數比較能夠深刻體認他們與其他華人在文化與經濟地位的明顯差異，同時也較易感受到他們因同鄉多為勞動或務農者而遭到訕笑或鄙視，因而更有透過結合群體力量組織起來的企圖。1973年的這場會議成功召開，並決議以李亞景為首的籌備委員會來擬定成立同鄉會的工作。可惜籌備委員在推動成立同鄉會卻缺乏動力，最後只好停頓下來。原因可能出在草創初期的艱難，特別是需要經濟上的支持才有可能讓同鄉會運作無虞。

恰好在1974年，吉隆坡河婆籍的發展商蔡家像的古來發展房地產，開發新古來市的南達花園住商區（即當地人口中的21哩）。數位鄉親向蔡氏獻議於開發藍圖上劃撥一塊地段，捐獻給柔佛同鄉會，蔡氏乃慷慨答應，並捐贈了兩間店屋的地段，作為未來建設河婆同鄉會會所用地。這似乎部分解決了同鄉會創立的一個大難題，因為人們要集資購買土地、建築會所、維持會所日常開銷運作，都需要大量的經濟資本，尤其是土地與建築費用，如今有了一塊土地，等於解決了大部分的棘手問題。於是籌委會乃擇日在該地段舉行豎立同鄉會會址門牌之儀式，並邀請各報記者前來報導。此事獲各華文報章南部新聞版圖文並茂的報導，同鄉們也都欣喜萬分，認為這次同鄉會一定可以組織成功。但顯然鄉親對成立同鄉會的熱度還是短暫的，整個籌備的活動再次沈寂下來。

隔年（1975），地段捐贈者蔡家像來函詢問同鄉會的進展，並告知籌委會若同鄉會成立持續停滯不前，他將收回捐贈的地段。籌委會乃召開緊急會議，認為柔佛鄉親不爭氣，讓籌備事務延宕多年。同時也認為由李亞

景主持的籌委會，似乎很難在柔佛河婆鄉親間取得共鳴。會議決議派代表到新山拜會籌委會顧問拿督劉南輝，並說服劉氏出來領導籌委會。劉氏答應後，開始擴大籌委會組織，並擇日召開會議，邀請全柔佛州八縣市所有的河婆社會領袖賢達到新山與會。會議決議推動籌募同鄉會會所建築基金、繪測會所大樓建築圖以及向社團註冊局申請註冊等等。在劉氏的率領下，展開了新建大樓的募款計畫，並順利於 1976-1977 年間募得數十萬馬幣；同時，社團註冊局也在 1976 年底通過柔佛州河婆同鄉會的正式立案註冊。同鄉會第一屆理監事也在 1977 年會員大會後正式上任，劉南輝則順利被推舉為第一屆同鄉會會長。以劉氏在商界的人脈，以及其本身的事業發展，¹³讓同鄉會會所興建更獲得河婆各界人士的支持。1979 年，劉氏主持河婆大樓的動土禮；兩年後的 1981 年，河婆同鄉會會所正式完工。¹⁴

參、河婆文物館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塑造

根據報載，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馬來西亞華人鄉團組織、廟宇管理委員會以及個人紛紛興起設立大大小小文物館的風潮。陳亞才將這樣的風潮定調為華人個人或集體文化焦慮之結果，他認為是馬來西亞官方偏頗國家歷史觀和華人自身文化失傳焦慮的雙重影響之結果。前者已如前述，部編教科書完全抹煞了華人在這塊土地的事跡和貢獻；後者則是由於世代差異，讓華人鄉團組織、寺廟掌權的中壯世代，發現年輕世代對方言母語和各種族群傳統或祖籍文化的漠視，對祖先歷史知識不足或片面和誤解，

¹³ 劉氏以木材運輸業起家，後來更涉足油棕種植業，以及衍生自木材和油棕產業的油棕榨油廠、木材火鋸廠、夾板廠、酒店旅游等多元化的企業經營，其業務遍及中國及東南亞各國。

¹⁴ 本節有關柔佛州河婆同鄉會成立過程，主要參考〈柔佛州河婆同鄉會倡始人〉，網址：<https://www.hepo.org/hopo-johor/others/changshiren.htm>，以及〈柔佛州河婆同鄉會簡史〉，網址：<https://www.hepo.org/hopo-johor/others/xianghuijianshi.htm>。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1 日。

所以才陸續創設文物館或開辦方言母語班等。¹⁵

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機構，早在殖民時期以及後殖民的馬來西亞國家所利用，它被當局用來服務於執政當局的需求，再現與主流民族主義情緒一致的國家故事；同時，呼應國家文化政策，淡化前伊斯蘭時代的歷史、忽視少數民族歷史、強調馬來人至上、壓制可能挑戰或動搖現代國家主導敘事的歷史和文化。¹⁶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與 Carl Grodach 指出，從 1960 年代開始，人們開始爭論關於博物館的基本原則和再現技巧，過去以優勢民族和精英的精緻文化為主的主流博物館備受懷疑和爭議，因而引發更深遠的關於少數族裔自我定義和價值觀的更大辯論，促成了美國洛杉磯開始出現大量少數族裔博物館。這些博物館大多為少數族裔社群所創建，且就座落在他們所聚集的社區裡。它們通過博物館來記錄、詮釋和展示其社群的藝術、文化和歷史。¹⁷柔佛州河婆文物館的創設也可以放在這個脈絡裡來理解，也就是它是少數族裔尋求自我界定與文化價值的方式，以呈現在國家主流博物館中被消失的歷史、文化和族群性。

這間位於古來大街上河婆同鄉會二樓的文物館於 2016 年 9 月建成，

¹⁵ 陳絳雪，〈消沈與傳承 第 3 篇：文物館與歷史的訊息〉（2015）。網址：<https://iconada.tv/m/group/discussion?id=3600580%3ATopic%3A274173>，以及陳亞才，〈華社文物館進展觀察〉。《東方 Online》，2015 年 12 月 19 日。網址：<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news/wenhui/2015/12/19/118519>。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23 日。

¹⁶ 參考 Abu Talib Ahmad, *Museum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 (Singapore: NUS, 2015), p. 12. 以及 Jackson Rockett, “Map, Census, Museum: Imagining the Malaysian Nation-State and the Malay Identity”, B. A. Honor Thesis,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ine: Colby College, 2023), pp. 70-71. 網址：<http://digitalcommons.colby.edu/honourstheses/1417>。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5 日。

¹⁷ 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and Carl Grodach, “Displaying and Celebrating the ‘Other’: A Study of the Mission, Scope, and Roles of Ethnic Museums in Los Angeles”.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26, no. 4 (2004): 49-71.

可以分成四個展區。¹⁸首先第一個展區就在樓梯間。第一展區主要展示手法是以大型壁紙張貼在一樓直達二樓的牆壁上。展區的主題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炎黃子孫」的源起；第二部分則是中國歷朝歷代跟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有關「炎黃子孫」源起主要是透過對「華夏」、「黃帝與炎帝」、「龍與鳳的圖騰」之解說；以及三皇五帝、三代來說明中國文明以及中國人的起源。第二部分的中國歷朝跟東南亞各國關係則是從春秋戰國直到清朝，敘事方式以條列「史實」和「考證」為主，「史實」的部分聚焦於中國歷史紀錄中出現東南亞各國地名，再透過「考證」來加以說明。其中有三類「史實」是本展區所強調的：（一）秦漢兩朝實質統治越南北部地區，並將之劃入郡縣中；（二）東南亞各地小王國與中國各朝代官方的藩屬或朝貢關係；（三）中國移民前往東南亞各國。

綜觀第一展區在文字敘事上都盡可能減少，以減輕觀展者的閱讀能耐；惟中國歷史龐雜，許多歷史或文明的論點並未有定案，¹⁹譬如對三皇五帝的不同說法等等，但在樓梯間的空間限制下並無法呈現出來。再者，在「史實」的呈現上如前述的三大類別，尤其著重在對越南北部地區的統治以及朝貢關係上，中國移民的部分則只放在最後的清代來敘述。最後，在中國移民部分主要以「羅芳伯建立蘭芳共和國」、「葉亞來建立吉隆坡」、「吳仁靜、鄭懷德協助越南嘉隆帝（阮福映）復國」、「侯阿保效力菲律賓賓獨立戰爭」等為條列。這部分的「史實」幾乎跟河婆人沒有關係，其展示的目的主要為從中國文明出發，建構華人（包括客家人）的源起，連結展館內河婆客家人與中國/華夏人之間的關係。這是從中國歷史縱深來賦予

¹⁸ 就在河聯於雪隆河婆同鄉會創立馬來西亞河婆文物館不久，柔佛州河婆同鄉會之後也正式啟用耗資 20 萬馬幣的柔佛州河婆文物館。在開幕致詞時，當時的黃福庭會長指出地緣性社團組織的功能隨著時代而改變，文物館的創立是河婆同鄉會承擔文化傳承重責大任的一種方式，他希望透過文物館能夠吸引河婆年輕人來參與同鄉會（中國報，2017.12.3）。

¹⁹ 王健文、陳弱水、劉靜貞、邱仲麟、李孝悌，《中國文化史》。（台北：三民書局，1997）。

一個族群歷史感的過程，畢竟，河婆人在柔佛州的移民始於 20 世紀初，如果沒有古代中國歷史縱深為基礎，則河婆人跟柔佛州的歷史關係將會非常的短淺。透過中國歷史的縱深，使文物館得以延伸華人/河婆人的歷史至少五千年以上。如此，一方面藉以提升原本就自卑感重、自信心不足的河婆人；再者，則是讓一個群體得以擁有縱深的歷史，並在述說中彰顯本族自古存在的「史實」，讓族群成員對自身認同感到驕傲，形成並鞏固河婆人的群體意識。²⁰

文物館二樓佔地面積 3200 平方呎（約合 90 坪），呈長方形。為展示目的，在此空間中設置了一個倒 F 型的隔板。二樓正門即是倒 F 型隔板的底部空間，也是文物館的第二展區。此展區相對其他展區來得簡單，除了櫃臺外，隔板牆上掛著黑底金字「柔佛州河婆文物館」的牌匾。牆上壁紙為古來及其境內九個新村：士乃（Senai）、新港（Sengkang）、沙令（Saleng）、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泗隆園（Seelong）、士年納（Sedenak）、亞逸文滿（Ayer Bemban）、江加蒲萊（Kangkar Pulai）、武吉峇都（Bukit Batu）的舊店屋、合家照、割膠、修業證書、採錫、古來市區等為背景，顏色都清一色為橙黃與黑白照片。另外一面牆則為河婆地理介紹，包括河婆地圖、河婆中學大門口、河婆婦女唱山歌的照片為背景。這份壁紙的主題為「揭西縣」，文案主要介紹河婆名稱之由來及其在中國行政區劃的改變等。另外還有一份揭西縣交通旅遊圖，標明縣內觀光景點。

從右手邊進入，即是文物館的第三展區，也是整個文物館的重點展區，佔地最廣。隔板與牆壁之間形成一條長型的廊道，寬度約可容納二到三人同時進出。廊道的兩邊各有不同的展示品及主題文案。隔板與牆壁上各有白光燈，照亮文案或展示櫃。所有的主題文案底色都是橙黃色，在白光下更顯得陳舊或有讓人走入「時光隧道」的感覺。

²⁰ 歷史作為族群認同催化劑之討論，可以參考 Thomas Hylland Eriks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1993), pp. 71-73。

展區入口靠牆壁的地上擺放了跟稻子收成有關的器具：利用風力篩選稻穀的風鼓車以及舂搗稻穀的杵臼。根據館長說明，杵臼來自古晉鄉親，可能本地已經沒有人收藏，但種稻曾經是部分古來河婆人的經濟活動之一，因此有展示的必要。長廊右手邊地上擺放展示櫃，牆壁上則為主題文案與一些翻拍的舊照片，但文案與文物間並不一定有一一對應關係。主題文案內容以古來地方/重大歷史事件為主軸，而展示櫃內的文件及文物則主要為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東西，有的跟文案的敘述有關；但大多都沒有直接的關係。

主題文案一開始以「古來歷史」作為開端，說明古來的土地面積、人口、涵蓋的九個城鎮名稱以及境內的新村等。然後再進入「古來名稱由來」、²¹古來開埠經過、²²古來老街。²³之後的文案主題則是按照年代介紹古來的發展，譬如 1930 年代這裡出現了咖啡店、照相館、妓院、電影院以及雜貨店；海南會館於 1940 年代設立，並在會館內創辦了英才學校，而客家人也創設育才和崇德小學等等。這些主題文案以文字，間中穿插摘自鄧國先編著的《古來歷史圖片集》書中相關黑白照片。這部分文案的文字量較大，對於一般觀展者而言相當考驗其閱讀耐力，因此，文物館另外搭配一份「古來大事記」，即將每個年代的重要發展、事件、人物等，以更簡潔，類似懶人包的方式來呈現整個古來發展的過程。除了學校以外，其餘關於古來開拓以及市區發展幾乎都跟客家人或河婆人沒有太大的關係，反而是潮州人或海南人才是開拓和發展古來的先驅。

²¹ 最早的時候，這個地方稱為龜來，因為雨季時這裡必淹水，帶來很多的水龜，因此，每次水災時，這裡的海南人都喜歡說「龜來！龜來！」。因此，古來的舊名稱為「龜來」，後因為「龜」字難寫，才改成「古來」。

²² 根據展示文案指出 19 世紀末，潮州人李天成帶領許多同鄉於海南港登陸，開闢土地，種植甘蜜和胡椒，他顯然是第一個在古來開發的主要人物。

²³ 這裡主要是敘述古來市中心的開發經過，重要人物為海南人黃國茂、陳學鳳、符文章和吳萬志，以及潮州人陳肯構，他們先後於 1910-30 年間來到古來開闢種植園，或是建設市區商店如茶室、小吃店、酒吧、客棧，又或是建設古來市集等。

另外一個主題文案是關於古來縣九個新村的簡史，其中泗隆園新村的介紹最少，在文案中只說明泗隆園名稱的由來；而最大的新村則是士乃，有人口約兩萬。它們都是華人為主的新村，且主要都是河婆客家人。可見早期河婆客家人主要是散居在郊區地方，根據文案的描述，早期村民們的經濟活動都是務農，種植甘蜜、胡椒、可可、咖啡以及後來的橡膠和油棕，或是養豬等。

第三個文案主題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敘明客家文化；另外一部分則是客家人的經濟活動。在客家文化的主題裡，文物館從「客家人的稱呼由來」開始，指出「客家人」的稱呼起源久遠，以中原起源論或北來說作為其論據基礎，說明當被問及「為何人？」時，以「今為暫留客居人家，姑且稱我為客家人（在外作客之人家）」。然後即開始介紹客家文化，在這裡，文物館的文案主要鎖定兩個面向，一是飲食（客家擂茶、客家釀豆腐、客家茶粿、客家菜），一是山歌。根據文物館的文案，客家飲食文化緊扣客家中原起源的說法，包括擂茶與釀豆腐都跟客家人的大遷徙有關：

《擂茶起源》相傳在八百年前的唐朝，客家人就已經把擂茶當作是一種招待貴賓不可缺少的風俗文化。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環境，客家人便開始南遷，途中歷盡艱酸，幸好他們所攜帶的擂茶不但可以解渴，也能充飢……代表客家人那股刻苦耐勞的精神。

《客家釀豆腐》釀豆腐是中原傳統飲食習慣與遷徙地特殊產生生活方式相結合的典範食品。傳說釀豆腐源於北方的餃子，因嶺南少產麥，思鄉的中原客家移民便以豆腐替代麵粉，將肉塞入豆腐中。

《客家茶粿》客家茶粿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底蘊。從客家人的歷史淵源起，一千多年來，客家人從中原向外遷徙，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和海

外各地。客家茶粿是這個群體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是為適應和改變生存條件而創造出來的獨特的飲食。

山歌的部分則強調其特色為「即興、融合客家人生活題材且善用隱喻與雙關」。

第四個文案主題為客家人的經濟活動。這部分的文案主要介紹客家人傳統從事的經濟活動，如錫礦開採和甘蜜、胡椒、鳳梨和橡膠種植等的一級產業，採礦業基本上並非古來地區客家人的經濟活動，在這個文案裡主要介紹的是霹靂州和吉隆坡地區的錫礦開採和客家人的關係。相反的，種植業似乎才是古來河婆客家人的經濟日常。可以看得出來，古來河婆人從事的產業本身都深受世界經濟市場波動之影響，即它們都是經濟作物，跟土地的關係有的甚至是短暫的。譬如甘蜜與胡椒是需要不停遷移的經濟作物。從跟土地的關係來看，河婆人的經濟生活展示更凸顯了他們（或更大範圍的華人）的移民性與移動性：他們跟這塊土地並無深遠的、牢固的關係，畢竟他們祖先出洋的目的並非「移民定居」，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衣錦還鄉。當然這裡還有從殖民到後殖民時期政府的土地政策影響，使得大部分華人農耕者不容易取得農地所有權的限制。

上述主題文案都是以壁報的方式貼在牆壁或隔板上，比較小與輕型的文物置於展示櫃裡，大或重型的文物則置於地上或木架上。展示櫃的文物有舊鈔舊幣（含模里西斯、英國殖民時代、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時代、日本佔領時代的軍票）、舊瓷器、上鏈鬧鐘、懷錶、古代錫幣、²⁴私家買米人牌照、²⁵居民證、²⁶縣議會稅單收據、駕駛執照、腳車註冊卡、護照、登

²⁴ 根據記載，馬六甲早期是著名的錫產區，當時南來馬六甲的中國移民，以錫塊鑄成動物形狀的錢，作為當時海外貿易經商之用。文物館展示的錫幣，顯然並非產自古來。參考林瑞源，《漫步古城老街談故事》（上集）。（馬六甲：羅印務（馬）有限公司，2010），頁 240。

²⁵ 這是英政府剿共時期新村居民持有的個人購買米糧之紀錄，如此政府可以控制

岸准證、²⁷結婚證書、舊時請柬、馬華公會會員證、戰損報告回執聯、²⁸書信、存摺、小學成績冊、霹靂小香女子裁縫傳習所（古來分所）畢業證書、小學畢業證書、莉莉婦女裁縫訓練所畢業證書、雜技團宣傳單、電影傳單、爪夷文電影傳單、²⁹木枕、筷子筒、德士准證、³⁰狗牌、³¹髮剪、³²水煙壺、磨刀石、割膠頭燈、膠刀、膠杯、³³鐵熨斗、長鋸、龍/鳳紋熨斗、木刨、秤鉞。大型文物有鍍鐵桌腳、斧頭、扁擔、三叉、大秤、打字機、龍紋甕、牛鈴、³⁴河婆獅、³⁵酒甕、收銀機、轉盤電話、手轉縫紉機、鹹菜甕、籐籃、

每個家戶的購買量，避免人們購買多餘的米拿去支援共產黨份子。

- ²⁶ 新村成立後，村民們都被發放一張居民證，上書：「持此卡片者乃上述區域之居民。當離開此區時，需將此卡片交與哨站警員，而於回來時領回。若要離開此區域十二時以上，需向移植區辦事處預先報告及領取證明書。」
- ²⁷ 這是英國殖民時期對於新到馬來亞移民所頒發的證件，其相關規定如下：（一）凡領有此項准證之外籍人民於其將來再到此埠時不得根據此准證以求豁免履行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外籍人民律例丙）之一切規定手續。（二）凡領有此項准證之外籍人民無論何時均可向其居留埠之移民廳長請求將此准證轉換為入境執照而免另行繳費。（三）凡領有效力之入境執照者得以履行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外籍人民律例）第一編內所規定之一切手續。
- ²⁸ 二戰期間，古來地區遭受戰損，戰後，人民可以向英國殖民政府提出戰損賠償，政府在收到戰損報告後，會請專人進行戰損評估，再以評估報告作為賠償之基礎。
- ²⁹ 爪夷文是指用阿拉伯字母來書寫馬來語的文字。
- ³⁰ 即開計程車的執照。
- ³¹ 這是指政府對狗隻飼養的註冊登錄並發放一個印有編號的牌子，牌子必須戴在狗項圈上，否則會被政府捕狗隊視為野狗而加以撲殺。
- ³² 手推剪理髮器。
- ³³ 割膠頭燈是戴在膠工頭上的照明設備，由於割膠必須在早上太陽出來前完成，所以需要照明以在烏漆麻黑的膠園裡看清楚道路和方向。膠刀是指專用于割膠的刀子。膠杯則是綁在膠樹上，收取膠汁的杯子。
- ³⁴ 懸掛於牛隻脖子上的鈴鐺。
- ³⁵ 河婆也有方口獅。根據柔佛河婆同鄉會前主席黃富庭在接受報紙採訪有關河婆獅時，提到河婆獅獅嘴為四方形、河婆獅的鼓為小鼓，擊鼓時掛在身上、雄獅獅頭寫有「王」字，母獅則有八卦、大頭佛面具的雙眼沒有洞，表演時必須不時低頭從嘴巴的位置往外看；且大頭佛手持摺扇而非蒲扇、除了大頭佛外，還有猴臉面具，手持藤盾牌表演，這些的特點，黃富庭認為比較接近北獅而非南獅。他也認為河婆人舞的其實是貔貅，河婆人通俗說法為獅，故而有舞獅的說法。黃富庭也指出目前存放在柔佛州河婆同鄉會文物館的兩個獅頭、大頭佛及

信箱、陶鍋、大小籬隔³⁶。這些文物有的只是單純的日常性與功能性的器具或配備，這些東西就如文物館摺頁傳單上寫的：

館內展示的古物、文物、資料與舊時生活用品等，訴說著華裔先輩從中國南來後的情景與事蹟，並不限于單一籍貫的河婆客家人。

換句話說很多文物館內的文物大多是當時華人家庭所使用的各種用品或工具，並非只有河婆客家人才有。有的則充滿個人或家族故事的文件與文物，可惜這些文件或文物，除了少部分有進一步說明外，大多就只放個名牌，因此需要專人導覽才能進一步了解背後的故事或歷史脈絡。但鑑於各種條件的限制，目前導覽主要是由文物館館長親力親為。

最後一個展區是在倒 F 形隔板上，以大型輸出的壁紙（亦是橙黃色）展出「姓氏堂號簡介」。文案內容介紹堂號為姓氏祠堂，通常分成兩種，即姓氏發祥地郡號為主的地望堂號；以及祖先功名或道德文章命名的掌故堂號。由於多個姓氏同出於一個郡地，故而會出現多個姓氏共用一個堂號的現象，如梅州的李、董、彭氏皆為隴西堂；陳、鍾、馮、賴、韓姓則皆為潁川堂等。也有一個姓氏多個堂號的，如楊氏的總堂號為弘農，其餘支系的地望或掌故堂號則可以是天水、棲霞、四知、關西和紹德等。文案提到由於客家人注重崇先報恩、尊祖敬宗，因此，特別重視修譜牒、建祠堂、祭祖先。堂號即為祠堂的名號，也就為客家人所遵從。姓氏血緣關係乃是務農的河婆人群重要的關係網絡原則，直到今天，新村裡的擬血緣姓氏宗親會的力量還是很強大，特別是古來河婆客家人的四大姓氏—劉、黃、張、

猴臉面具，都是 1976 年李頗去揭陽時買回來的。參考劉彥運，〈走訪河婆同鄉會文物館 了解你不知道的河婆獅〉。《中國報》C4 版。（2018 年 9 月 6 日）。

³⁶ 籬隔也稱為謝籃，是用竹篾編成，小的為一人提的謝籃，大的則需要人挑，通常為成對，每隻大籬隔分底、中和上層三層，再加蓋子，喜慶時裝禮品；祭祀時則用作挑牲禮之用。參考臺灣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籌備處，〈謝籃（長籬隔）〉，網址：<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2/b1/da.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1 月 28 日。

蔡，使得姓氏堂號在河婆文物館的展示有了意義。一方面它強調河婆人在這方面的社會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可以非常完美地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³⁷

綜觀各主題文案可以發現其中佔據篇幅最大的，來自兩個歷史時期和事件，顯然這兩者是第三展區裡重要的主題，此二時期分別為「日據時代」以及「馬共對抗時期」。底下分別論述這兩個時期及其事件。「日據時代」總共涉及四個子題文案，即（一）「日據時代」；（二）古來縣二戰時事蹟；（三）抗日英雄黃子松；（四）南僑機工史略，以及因應南僑機工史，而由柔佛河婆同鄉會發起的四輪驅動遠征隊之活動。³⁸文物館用了大量的文字紀錄了這段歷史過程，底下簡述各子題的主要敘事內容：

（一）日據時代（1941年）：描述了古來大街及海南會館被炸毀、港主陳玉鳳的別墅成為日本憲兵部總部、民眾逃入黃梨山、老巨港、玻璃城或烏水港等地避難、日軍以鐵騎隊在街上巡視、日軍將勝光戲院改為日本學校，強迫華人唸日文、被俘虜的華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必須替日軍建造滇緬死亡鐵路。

（二）古來縣二戰時事蹟：

（1）日軍入侵：新加坡、振林山及古來村民，逃到老薯廊避難，暫居培華學校或親友茅舍。1943年日軍進入老薯廊，令居民火燒培華學校、住家及所有的鳳梨園，迫使村民步行到古來、新廊或彭加蘭。一些逃難的村民將大量金銀珠寶埋藏在榴蓮頭之地下。當日軍要入據

³⁷ 從砂拉越華人研究中，田汝康也告訴我們早期古晉內陸地區河婆客家人的血緣網絡關係的重要性，參考 Ti'en Ju-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Kuching: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 SUPP Headquarters, 1997(1953)).

³⁸ 至 2016 年開展止，同鄉會總共舉辦了十次四輪驅動長征活動，包括 2004 年的「四驅萬里尋根」；2005 年世界客屬懇請大會；2007 年「情牽閩粵贛·四驅上海行」；2010 年「河婆行」；2021 年「金秋東北邊疆行」；2013 年「西遊記」；2014 年「誠毅行」以及 2015 年的「西域行」等。

新加坡時，遇到義勇軍頑強抵抗，同時，英軍把連結新山與新加坡的吊橋炸毀，日軍只好改成水上入侵，擔心軍情洩漏，日軍乃將周遭如邊佳蘭、林桂、新港、德華興、玻璃城、沙令、羅士谷的居民殺害或活埋。

(2) 日語學校：1942年，日軍指示華僑協會於勝光戲院開辦日語學校，分上下午班上課：上午班以華語教學，學生有百多人；下午班改教日語，學生有五十多人，都是十三、四歲的華族學生。負責教日語的是日本警備隊隊員小林亮一和井上。完成九個月的初級日語學習獲頒畢業證書。

(3) 土乃大屠殺：其中上街巷口河旁有數十人被殺，大雨把屍體沖到土乃河，河水被染成鮮紅色，土乃港進海南港牛路，也有三十多人被殺，大部分是客家人，當時黃炳南洋樓（今江夏堂）被徵收改為日本憲兵部，專門用來拷打審問可疑份子。日軍到處搜索可疑份子時，大人都把小孩丟下，奔向後山的野樹叢間躲藏，大家都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艱苦日子。

(4) 抗日軍第四獨立隊成立：日軍佔領馬來亞後不久，柔南成立抗日軍第四獨立隊，他們活躍於土乃、泗隆、玻璃城和笨珍一帶。他們挨家挨戶向群眾宣傳抗日軍任務及向民眾募集食物，也號召青年加入。抗日獨立軍擊斃赴恆（興）順港的日本軍官，並於 16 哩打死數十名日軍，抗日軍的游擊行動宛如中國戰場的延伸。日軍採取更大規模的計畫性殺戮：1942年4月5日包圍並殺害沙令育德小學寄宿的潮州籍難民，男女老幼約 250 多名；1943年6月，日軍屠殺德茂芭一帶 900 多人；日軍多次到泗隆園，見人就殺，並把整個泗隆園的房屋都燒毀；在古來 7-3 園，日軍集體屠殺了 400 餘人，林金殿園一帶 400 多人被殺害，泗隆園後方一帶，1300 多人被殺。德茂芭 270 人，符志鵬芭 800 多人，林金殿約 100 多人。以上都是戰後收屍、挖掘骸骨工作的紀錄，不包括當時遭日軍掩埋與被火燒死的民眾。

(三) 抗日救亡運動英雄--黃子松 (1881-1975)：介紹黃氏祖籍揭陽河婆連城寨，少壯南來吉隆坡當礦工，約 1915 年南下士乃拓墾，而後與蔡願合資創立〈成利號〉經營水果與雜貨生意。後自創〈新成利〉，逐漸發展種植與運輸業，且購置店屋房地，成為知名殷商。1937 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黃氏為積極響應了陳嘉庚的號召，參與成立南洋華僑籌賑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並在士乃成立華僑籌賑支會及華僑抗敵後援會，奔走各地籌募物資與金錢，前後招募兩批愛國華族青年參加司機回國抗日服務隊，支應參訓人員一切費用，並使用他運載鳳梨的貨車來訓練隊員駕駛技術，支援中國抗日救國運動。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登陸馬來亞，參與華僑總會的成員紛紛走避國外，黃氏堅持留守而被捕，被帶到新山日軍憲兵總部，日軍軟硬兼施逼供，要求他提供同夥名單，惟遭其拒絕，黃氏的氣節頗令日軍佩服，在折磨兩個月後才被釋放。據聞黃氏也曾為 200 多名被懷疑是抗日軍的村民挺身而出，戰後，中國當局對他積極投入抗戰救國運動而給予表揚。1961 年，耳聞家鄉人民生活困苦，乃購買了百箱布匹、藥物、糧食等，獨自一人坐船運送物資到河婆連城。

(四) 南僑機工史略：1937 年爆發七七蘆溝橋事件，中日大戰。1939 年新加坡籌賑委員會主席陳嘉庚登高一呼，南洋各地僑領熱烈響應。當時士乃僑領黃炳南亦不落人後，招募青年，並提供卡車訓練他們的駕駛技術；約有三千多名熱血青年共赴國難。他們從新加坡出發，由海路途經越南，輾轉進入昆明，在滇緬公路上，不顧安危地將槍械、藥品等救援物資送往前線。據統計，有千多名南僑機工犧牲，千多人返回南洋，另外千多人則滯留在中國。為紀念這群壯士，2012 年 8 月 13 日，柔佛古來各華團、宗親會館等聯合出資，於富貴山莊內矗立【南僑二戰抗日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河婆同鄉會也組織四輪驅動隊，

重遊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行駛的活動，以讓人緬懷這些抗日的無名氏之壯舉。

上述引用的四段文案主題都環繞在中日戰爭，以及二戰時期古來各地發生抗日活動和日軍屠殺民眾的慘狀。文案總字數超過 2000 字，所佔篇幅非常大，非一般觀展者有能耐閱讀完的。跟底下要介紹的馬共時期，共同構成文物館內重要的歷史片段的再現。

馬共對抗時代的展示篇幅也很大，文案內容涉及至少三個主題：一是國共內戰的延伸；二，新村的出現：

（一）國共內戰的延伸：1946 年，戴子良、符文章、郭盛芳、黎生、林坤生、蔡錦標、陳雲波、丘乃黨等人，發起籌建古來中華公學，一年後中華公學。1948 年，馬共出動百餘人包圍中華廊（塑料廠），開槍掃射並縱火燒廠。較後步行到陳寶錦之住宅，掃射十來發子彈。陳寶錦當時是古來中國國民黨主席、中華商會主席及中華公學董事長。1949 年 8 月，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新街場、黃梨山、老巨港、老薯廊、玻璃城、三角店及三號公司之三千多名村民，受通令遷居到現今的蘇丹娜街及依布拉欣街。古來新村於焉形成。1950 年古來成立了全柔首個地方議會，由村民自由投票，選出地方議員。

（二）新村的出現：因緊急狀態而來的居民重置計畫之產物即是「新村」，文物館對於古來地區的九個新村進行了介紹，節錄部分內容如下：

（1）新港：距離古來市區約 5 公里，人口約一千餘人，房屋不及 200 間，商店也僅有 5 間。村民以華裔為主，客籍居多。新村的巫裔共 28 戶，印裔也有 22 戶。早期，新港新村一帶的居民皆散居在 24 哩、士古來河支流一帶（新港洪仙大帝廟一帶），開墾土地耕種甘蜜、鳳梨、蔬菜、橡膠樹或養豬養雞等維生。

（2）沙令：二戰前已有人定居，它從最初的 10 餘戶散居人家發展成今日約有兩萬居民的新村。當中華人佔了大多數，約八成，華人

中又以客家籍貫佔多數。早期的沙令以河婆、惠州客家人佔多數，雖然也有其他籍貫人士，但多數人都能以客家方言進行溝通。新村成立後，政府嚴厲監管居民的起居，除了傍晚6時至隔日清晨的宵禁外，對於居民的糧食配給也非常嚴厲。當時賣米的雜貨店都必須有政府所發出的准證，居民則被禁止在自己家中煮食，只能在每天傍晚攜帶寫上號碼的鍋子去領集中烹煮的大鍋飯。

(3) 加拉巴沙威：第一批從士乃遷入加拉巴沙威的河婆客家人共13戶人家。他們約於1937年時，在黃子松的安排下搬到24碑附近落戶。加拉巴沙威早前稱為長安村，又俗稱26碑。這個地方周邊原是散居的村落。大約1930年代時一批河婆客家移民來到24碑，後又在附近的“五百咭”、“七百咭”及26碑、27碑拓墾、割膠、種鳳梨、種菜與養豬。緊急法令後，散居在周邊的居民被迫遷入26碑新村範圍內居住。早期的加拉巴沙威以盛產胡椒聞名全國。據了解當時65%的村民以種植胡椒維生。1982年中，農業銷售局宣布徵收胡椒出口稅後，人們便開始轉種其他農作物如可可、油棕和蔬菜。因此，胡椒種植業轉盛為衰而沒落。

(4) 士乃與泗隆園：士乃原是蠻荒地，先是瓊州人與潮州人港主陸續來到這裡，開發了海南港以及興順港（恆順港），以種植甘蜜與胡椒為主，利用舢舨，將出產的農作物，沿河輸出到新山。1909年，火車從新山啟程，向北行所經的第一站便是士乃。中國南來移工在契約到期後便陸續到士乃種植黃瓜、長豆暫作糊口。1915年前後，黃子松與新加坡商人蔡願合資創設成利號；經營雜貨，之後蔡願逝世，其子蔡俊美以老成利號繼續營業，而黃子松則改用新成利之名，這兩間商行，成為昔日過番渡海的客家同鄉必到之處。其後，部分農民前往海南港、泗隆園、沙令及古來等地開墾，收成後便運來士乃，使它迅速成為南方貨物的集散中心。後來，鳳梨價格大漲，大批客家鄉親從

中國來墾荒，部分則開始開店經商，漸漸形成上街，同時數十戶人家散居在士乃周圍，直到富商黃炳南到來，在下街興建數十間店屋，士乃上、下街的商業活動才逐漸鼎盛起來。1950年3月，英政府施行布里格斯計畫，強行把散居在恆順港、紅豆水、柏成園、海南港等地的農民，移植到士乃新村，以切斷農民與馬共的聯繫。上泗隆、下泗隆的居民則被遷入泗隆園新村，德茂芭一帶居民則遷入德茂村（後改名為羅斯谷）。

(5) 士年納：士年納新村 2013 年人口約 350 人；2000 年時人口有 1212 人，房屋約有 300 間。現居住在村內的主要是老年人，以農業為生；年輕一代多往外遷以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居民中以華裔佔大多數，還有少部分的印度裔與馬來裔，而華裔中又以客家人佔多數。該地原是英殖民政府為開墾森林而建，以吸引附近城鎮的園坵工人前來工作與定居。初時，村民主要散居在鐵道兩旁，主要街道亦建在鐵道附近，直到馬共對抗時，殖民政府援引緊急法令將村民遷至現在的村址。

(6) 江加蒲萊：1942 年日本入侵時，計有 300 位居民被殺害。新村也是緊急法令時期的產物。1960 年，地方議會宣布分配每戶人家半英畝土地作為農耕用，但卻因申請者太多，土地不夠分配而遲遲不批准居民的申請，於是居民們於 1964 年始自行佔地種植膠樹，後又改種胡椒。1968 年 9 月 9 日，當局勒令居民於限定的日期內歸還土地，否則將面對後果。經居民與當局的磋商與談判後，當局最終同意居民繼續在各自的土地耕種。1970 年起農民逐漸改種油棕，新村的經濟活動亦多元化，新住宅區與店屋亦相繼建立起來。

(7) 亞逸文滿：大多數村民從事農業和漁業也有的從事家禽養殖業。村裡人口大約 3000 人，馬來人和華人是最主要的族群。

(8) 武吉峇都：新村現在約有 500 戶家庭和約 3000 村民。武吉峇都新村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咖啡、蔬菜和油棕種植。製鞋工廠和燕

窩農場也是新村其他收入來源，此外，村民也有聘請外勞在油棕園工作。

從上引述的兩大歷史事件——日據與馬共——以及其延伸的人物、抗日活動、新村等，佔文物館展示文案篇幅頗大，顯然是文物館的重要展示面向。誠如文物館的摺頁傳單指出：「緬懷先輩們不畏艱辛，即使飽受二戰時日軍的蹂躪，亦奮鬥不懈的精神」，這種奮鬥不懈的精神充分體現在黃子松這位人物的故事裡，也彰顯於被迫遷居新村的河婆村民們的生活。而這種刻苦堅毅的精神，與河婆人被稱為河婆牛的強悍不服輸又肯吃苦耐勞的個性不謀而合。除此之外，對照於國家博物館對日據時代對馬來民族主義的加持作用之強調，以及完全抹滅馬共對馬來西亞反帝反殖運動的貢獻，³⁹文物館特別凸顯這兩個時期的歷史片段，代表者華人與國家歷史敘事的分庭抗禮。

總的來說，古來河婆文物館透過四個不同展區，一方面將古來河婆人放置到河婆原鄉與中國歷史文明的脈絡中，以縱深族群本身的歷史深度，達到榮耀河婆群體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歷史長廊中，文物館特別凸顯日據和馬共對抗這兩個歷史時期及其事件，凸顯古來河婆人在那樣艱困的時期，都能夠秉持強悍不服輸又肯吃苦耐勞的精神；同時凸出華人的歷史記憶，以塑造河婆人的群體意識。但在各種條件的限制下，文物館的展示手法都過於單純，只有文字與文物，且兩者間無法達成充分的溝通。文字大多平鋪直敘，只有少部分節錄訪談，故事性明顯不足，且冗長的文字敘述對觀展者的耐性是很大的考驗。⁴⁰

³⁹ 參考 Abu Talib Ahmad, *Museum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 (Singapore: NUS, 2015), p. 121.

⁴⁰ 在馬來西亞河婆文化基金會出版，由張如嬌主編的《飄洋過海創新天：河婆人難來的故事》（2017）的大部頭書籍中，就搜集了很多河婆人在士乃、古來的遷移、奮鬥故事的介紹，若能結合這部分的故事於文物館中更為理想。

肆、結語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建構與復振必須放置在馬來西亞國族形成過程之脈絡來理解，但在華人文化建構與復振的過程中，除了從把華人視為一個整體來視察外，也應該從個別的華人語言群體的處境和反應來切入，以彰顯華人社會對獨立後馬來西亞國族建構的多樣化回應情形。本研究以柔佛州河婆同鄉會成立的河婆文物館作為考察對象，將之放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以及河婆人在柔佛的脈絡，以了解河婆文物館的創設與其展演的方式和意圖。就馬來西亞國族形成來看，1970年代是個轉捩點，即從繼承殖民時期的自由放任方式轉向鞏固馬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導性的治理模式，這使得華人紛紛在各個領域內展開對國家措施的反應，在文化領域裡，各地相關文物館的設立是個明顯的例子。

本文所研究的河婆文物館是附設於柔佛河婆同鄉會之下，因此不可避免地必須對柔佛河婆同鄉會的出現有所探究，研究發現河婆人在柔佛州主要都聚集在鄉鎮區，主要是因為他們過去從事的經濟活動大多為農耕相關。在鄉鎮地區的河婆人，人際社會關係主要奠基在擬親屬／血緣的關係上，姓氏宗親成為人們網絡關係的主軸。因此，雖然早在1960年代，一些熱忱的河婆鄉親已經對成立統合所有河婆人的地緣組織之必要性有所認知，但卻一直無法在柔佛鄉鎮河婆人間順利動員成立。即便在1970年代獲得鄉親慷慨捐贈古來的土地，也沒能有效號召區域內的河婆人共組社團組織。一直到事業有成的劉南輝接掌籌委會主席一職，才在他廣泛的鄉親人際網絡、社會威望和財力的協助下，順利組成柔佛河婆同鄉會。

這個時期正是馬來西亞政治經濟與文化獨尊馬來穆斯林，並朝馬來主權和穆斯林主義發展的開端，整體華人社會無不窮於應付如此的變革，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文化上都先後展現出對國家政策的回應、協商甚至挑戰。柔佛河婆同鄉會可以說是其中一種回應方式，以維護河婆人或擴大為華人整體團結合作及爭取應有利益的社會組織之一。在文化層面

上，仿效河聯在吉隆坡創設河婆文物館，柔佛河婆同鄉會也在 2016 年接踵成立自身的文物館。⁴¹分析文物館的展示方式與內涵有以下三點：一，文物館將中國五千年以上的歷史「史實」拼湊起來，以構建柔佛州河婆人的歷史縱深，敘明河婆人跟中國文明歷史的緊密關係，論證了河婆／客家人來自北方漢人之說法。歷史的縱深有利於提振河婆人的自信心。Yumi Kitamura 在一篇討論印尼華人文化園區的文章中，運用 James Clifford 對博物館的看法，認為過去博物館乃是控制大眾的場域，是支配群體藉由蒐集、佈置和展演被支配群體文化的場所；但發展到今天，博物館反而成為被支配或少數群體認同形成的重要途徑，發揮了作為支配群體與被支配群體之間「接觸區域」（contact zone）的作用。在後蘇哈多時期印尼政治經濟環境的劇變下，印尼華人的文化展演逐漸為印尼國家與政權所允許，並在 2000 年代初，由印華百家姓協會（Paguyuban Sosial Marga Tionghoa Indonesia）倡議在印尼縮影公園（Taman Mini Indonesia）內建立華人文化園區。她認為這樣的舉動一方面說明了後蘇哈多時期的印尼政權對華人文化、宗教和社會政策的鬆綁；但另一方面，從印尼華人文化園區的創設過程以及初步規劃來看，作者也看到不同的印尼華人或華人團體對於如何展演中國性（Chineseness）與華裔印尼性（Chinese Indonesianness）有著不同的堅持和看法。⁴²用 Kitamura 的論點來看，顯然在柔佛州河婆文物館中，我們看到了融合河婆性／中國性與華裔馬來西亞性（Chinese Malaysianness），即將河婆性／中國性如前述的中國歷史縱深嫁接在華裔馬來西亞性之上，雜揉出一種即強調河婆性／中國性，又凸顯華裔馬來西亞性

⁴¹ 第一間河婆文物館是由馬來西亞河婆同鄉會聯合總會（簡稱河聯）於 2015 年 11 月 19 日成立，它隸屬於雪隆河婆同鄉會。

⁴² Yumi Kitamura, "Museum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donesian Ethnic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8-9 (2007).
<https://kyotoreview.org/issue-8-9/museum-as-the-representation-of-ethnicity-the-construction-of-chinese-indonesian-ethnic-identity-in-post-suharto-indonesia/> (Date visited: October 4, 2023)

的混合文化形態，以抗拒國家在教育、文化、語言文字上的霸權。二，文物館的展示手法過於單調，主要為文物和文字，且兩者之間無法直接對話，加上文字敘述過於冗長。許多的歷史過程與文物本身的故事性，因展示手法侷限而無法呈現出來，顯得相當可惜。三，文物館的河婆文化展演以家用器物為主，這些被認為可以讓人們觀看甚至觸摸的有形物質文化，但這些器物本身，除了少數之外，並沒有河婆群體的表徵，因為其他方言群的華人也在那個時代使用同樣的器具。對文物館而言，更重要的是展現古來河婆人的堅毅不拔的「河婆牛」之精神，因此，文物館的主題文案特別凸顯了日據時代和馬共對抗期這兩個主題，明確地不同於馬來西亞主流的國家歷史敘事，將華人的歷史記憶作為華人認同的主軸，同時形塑出河婆人的精神。

責任編輯：鍾辰函